

被胡耀邦誉为「先知先觉」的人 胡战生

1949年的常书鸿父女 郑春光

马思聪先生之死 廖大同

往事杂忆：清华岁月 秦宝雄

帕顿少校的婚礼 马向红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OLD PHOTOS

老照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照片.第86辑/冯克力主编.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474-0878-0

I.①老… II.①冯… III.①世界史—史料②中国—现代史—史料
IV.①K106 ②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2377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40×203毫米

6印张 124幅照片 120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出版人 尹奎友
主 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第八十六辑

目 录

胡战生	被胡耀邦誉为“先知先觉”的人	1
郑春光	1948年的常书鸿父女	26
廖大同	马思聪先生之死	35
车毅英	回忆父亲车耀先	42
秦宝雄	往	63
龚玉和	父亲与“国立乙专”	85
苏 勇	一支鲜为人知的部队	96
王建国	解放初期的派出所所长	111
马向红	帕顿少校的婚礼	119

张建国	来自丹麦的“红屋顶”情结	127
刘忠帮	母亲这一生	145
飞 铭	旧时岁月旧时梦	158
刘萌瑜	追思我的丈夫刘恒	163
胡 剑	20世纪初的敦煌莫高窟和月牙泉	174
冯克力	一位老人未竟的书写	188

封 面	兄妹（刘忠帮）
封 二	1948年的常书鸿（秦风老照片馆）
封 三	马连良与卓别林夫妇



被胡耀邦誉为“先知先觉”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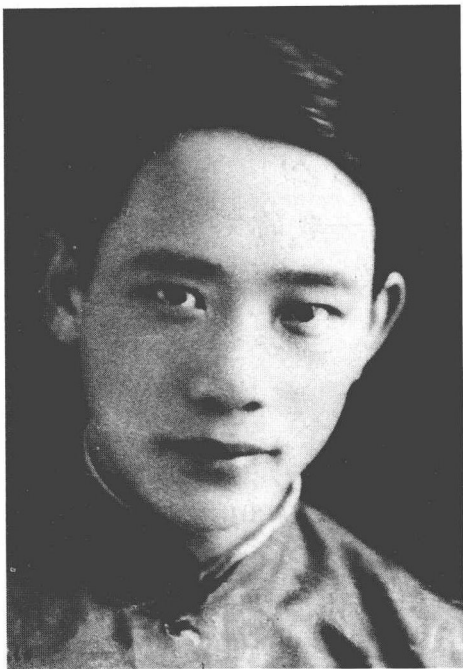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胡开明

胡战生

—

1913年1月31日，父亲出生在浙江省乐清县虹桥镇杏北村，原名胡志彪。家中没有一分土地、一间房屋，土地和房屋都是租的。因家境贫困，小学经常辍学，但他勤奋好学，辍学后经常站在教室的窗外听老师讲课，同学和老师都很喜欢他。那时小学有演讲课，在演讲课上，他常常慷慨激昂，言辞激烈，痛骂军阀、外国列强，讲到高潮时声泪俱下，不少先生放下手中的事，专门来听他的演讲。一位姓赵的先生感叹道：“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如此忧国忧民，慷慨激昂，将来必成大器！”

父亲十三岁小学毕业，到一家南货店当学徒，日子非常苦。1928年，在三哥的资助下，父亲借堂哥胡焜的小学毕业证书，考取了温州省立第十中学，随即改名胡焜。在那里，他加入了“反帝大同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撒传单，贴标语，演话剧，抵制日货。1931年初中毕业，学校说他是“赤色分子”，不允许他报考本校高中。在三哥的资助下，他到上海敬业



1935年，父亲在北平国立东北大学。

中学上了一年高中，因三哥失业，无力继续资助，他决定到北平求学。从上海到北平，因无钱买票，他多次被赶下火车。

在北平，父亲冒充东北人，考取了不收学费的冯庸大学，加入了青年团。1933年，冯庸大学与北平国立东北大学合并，他转入东北大学，担任东大抗日救亡会常委、东大在北平学联的代表，后为平津联合学联筹委会五常委之一。他和彭涛、黄敬、姚依林、康世恩、郭明秋、荣高棠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学生领袖。一二·九运动前后，父亲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当局将他内定为枪毙对象，把他单独关进死牢，他却乐

观地说：“假如我真的牺牲了，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机遇，因为‘一二·九’运动将来在中华民族解放历史上必有它光辉的一页，我死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是会留下我的名字的。”张学良当时是北平东北大学的校长，他派秘书宋黎带着手谕从西安赶到北平，让北平宪兵司令部释放学生，父亲始得获救。这个情节被杨沫写进了《青春之歌》，“许宁”的原型就是父亲。

二

1936年7月，父亲大学毕业，先到兰州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0月担任“东北民众救国会”宣传部长，后又参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宣传部副部长。

1936年12月8日，父亲主持“西安市各界民众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会后率西安万名学生、市民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当时蒋介石已经在临潼架好机枪。一个《西京民报》记者追上父亲说：“胡先生，再往前走凶多吉少，你有什么遗言，快告诉我。”父亲说：“现在还顾得上什么遗言？我死后你给我编吧！”张学良闻讯驱车赶上学生队伍，对父亲说：“我是张学良，我想和你们学生说几句话行不行？”父亲说：“校长讲话当然欢迎！”于是，张学良站在一个小土堆上发表讲话：“同学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的请愿书我看过了，你们的要求一点也不高，我完全赞成。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不过，你们不能去临潼，你们的要求，我一定转呈蒋委员长，我代表你们去请愿。如果你们相信我张某人，今天就先回去，我保证在三天之内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若逾期不答复，你们

可以砍我的头!”说着,他左手在自己脖子后面比划着,做了一个砍头动作。听到张学良的讲话,父亲带头高呼:“相信张副司令!”“拥护东北军北上抗日!”父亲觉得,请愿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在征得大家的同意后,将游行队伍带回西安。三天后,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12月16日上午,“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二将军救亡主张民众大会”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到会者近十万人,父亲任大会执行主席。1937年1月30日,西安成立了“西安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父亲被推荐为救国联合会主席。

1937年3月,父亲到延安,在“抗大”任四大队十二队救亡室主任,将名字改为胡开明。

抗战爆发后,父亲带领由四大队白区来的学员组成的白区



1936年3月26日,父亲出狱时与同学在绥靖公署监狱门口合影。(前排中坐者抱被子的是父亲)



1939年1月，在河北平山洪子店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门前合影。从左至右为：聂荣臻、熊伯涛、吕正操、彭真、刘道生、杨春茂、胡开明。

学生队，随聂荣臻的部队到晋东北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父亲担任学生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11月，父亲任山西五台县窑头区委书记、中共晋东北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38年1月至1945年4月，父亲先后担任晋察冀四地常委、宣传部长、副书记。1940年百团大战后，聂荣臻对父亲说：“你的宣传工作搞得很好，你们也是有功的！”

1945年5月，父亲任晋察冀新华总分社副社长、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社长为邓拓）。1947年5月，父亲作为晋察冀中央土改工作团团长，到阜平县王块区参加土改，他反对“搬石头”，抵制了土改工作中的极左路线，制止了土改中乱杀人的现象。

三

解放后，父亲先后担任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等职。1952年定为行政八级。1952年12月察哈尔省撤销，上级打算调他到华北局工作，他提出还是在基层工作好，所以留在了张家口，任市委第一书记。1953年，父亲调河北省委任工业部长、省委常委。1954年秋，任河北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

1958年，中国开展“大跃进”，从中央到地方都头脑发热，全民“大炼钢铁”、“除四害”、“放卫星”，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取消自留地，开办公共食堂，提倡吃饭不要钱，实行供给制，要求农民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父亲表示质疑：“难道社会主义就是这么建设？共产主义这么快就会到来吗？”“人民公社适合当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吗？”“这样全民炼钢，不是劳民伤财吗？”“这样弄虚作假放卫星，中央知道吗？为什么还相信呢？”“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没有一点具体措施，这不是一句口号吗？如何贯彻执行呢？”

父亲当时是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兼任省“大炼钢铁总指挥”，省委提出了年产120万吨钢的计划。父亲回忆：“越是没有炼过钢的单位，上报的炼钢计划越高；越是钢铁厂，上报的炼钢计划越低，因为他们知道炼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亲向省委提出，河北根本无法完成这么高的钢产量。但省长说：“我看你大炼钢铁不积极，干脆去搞运输吧！”父亲说：

“好，我保证你们炼多少，运出多少！”就这样，父亲的“总指挥”被撤掉了。



解放初期，父母亲在张家口人民公园合影。

1958年，河北省会迁到天津。一天晚上，我随父亲到天津小站看一个“卫星田”。此前，父亲看到报纸上说那里的稻田上能坐小孩，决定亲自去开开眼。到那一看，只见稻子种得密密麻麻，四周用绳子拦着；为了透气，还用鼓风机往里吹风；为增加日照时间，夜间在稻田上空装了多盏200瓦的大灯泡；化肥、基肥更是用了不计其数。

父亲悄悄问过一个老农，老农说，这是将好几块田的稻子栽在一起的。父亲对我说，这样搞卫星田，全国能增加多少产量？能搞得起吗？现在提倡的应该是改良土壤和种子，精耕细作，争取大面积增产，而不是搞这种“卫星田”。

第二年开春，父亲特意找到天津地委一位主管农业的干部：“小站那块‘卫星田’，到底打了多少粮？”那人眨眨眼：“颗粒无收！因为种得太密了，有壳无粒。”父亲感叹

道：“人能骗人，地可不会骗人呀！我们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才行啊！”

1958年，河北省委提出每个地区要搞一个共产主义试点县，省委要在徐水搞试点，让父亲负责提供汽车、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父亲冷冷地说：“汽车也好，拖拉机也好，都是中央统配物资，河北又不生产，我一辆车也没有。”省长说：“老胡，我看你对共产主义没兴趣吧？”父亲回答：“我对共产主义到底怎么搞法并不明确，但我入党时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对共产主义是感兴趣的。像这样靠外力在一个县先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对这样的共产主义，我不感兴趣。”省长



1954年4月7日，中共河北省委举行第十次全体会议。前排左一为胡开明，左三为省委书记林铁。



前排左七为陈云，左六为胡开明。摄于1960年10月。

说：“共产主义不像你想得那么遥遥无期，共产主义是两三年内的事情，现在就要搞试点。”父亲说，“我看不会这么快，共产主义是生产力的大发展，起码是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起来，我们还差一大截，怎能两三年内就能超过他们？凭什么超？”他对中央提出的“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口号也提出怀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是空想。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河北也接着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葛启以及张家口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几乎都被定为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省委派父亲到张家口进行整风反右工作，父亲做了大量的调查，认定葛启的讲话、观点、做法是实

事求是的，不存在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但葛的问题的性质是省委定的、中央批准的，父亲无力纠正。但张家口人民生活的疾苦，深深地触痛了父亲的心。回到天津后，父亲找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提出辞掉副省长职务，去张家口工作。林铁同意了他的请求。12月11日，中央正式批准父亲任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父亲到张家口后，跑遍了全区十四个县。越调查越感到问题严重。他紧急召开全区电话会议，决定“反右”急刹车，全区所有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一律平反，官复原职。

1959年到1960年的那个冬天，是一个最痛苦、最难熬的冬天。饿死人的现象大量发生，有的地方，草根树皮都被吃光了。父亲果断决定：立即在全区解散公共食堂；大力开发和推广代食品；要求省里提高张家口地区的口粮标准；针对农村出现的大量哮喘病人，他大胆决定下发解放初期公安局没收的大烟土，以防止哮喘病人因无药可治而死去；针对大量出现的浮肿病人，父亲向省委报告，要求宰杀一批老弱病残的大牲畜，以加强病人的营养，省委不敢批准，请示了中央，毛主席说：“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救人要紧！”

父亲与地委领导班子统一了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例如：分给农民少量自留地，以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允许农民用业余时间开垦小片荒，收成归自己；允许农民饲养少量家禽，让农民挣点活钱；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以交换生产、生活用品；为了发展畜牧生产，总结农民好的经验，提出了牲畜分户喂养，子畜与生产队分成，将大牲畜所有权和使用权统一起来；大力发展林业生产，允许农民承包林山、林地，等等。这一系列措施，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生

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采取这些措施，在那个年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父亲经过思考，认定人民公社的生产组织不适合中国农村目前生产力的发展，他提出了“关于农村生产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父亲的建议，河北省委不敢批。正逢毛主席到南方视察，回京路过河北。省委通知父亲，马上赶到邯郸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对“建议”表示赞同，当即批示：“中央政治局：这个材料你们看看，我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下放到生产队好。请你们讨论决定。”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将父亲在张家口郭磊庄的试点材料作为附件发向全国。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确定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父亲的思考并没有停止，他继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进行探索。1962年初，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两段话：

“我发现罩在庐山上的是‘左’的迷雾。现在的问题是对共产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中国国情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急于过渡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这是问题的实质，是主要矛盾。应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加以解决，再不能零打碎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在农业实现机械化以前，集体化程度不宜太高，因为它受着生产力的制约，如果无限度地集体化，就会使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

父亲从在农村做调查的实践中感到，以生产队为单位，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一天，父亲听说

张家口郊区有一个生产队，蔬菜和庄稼长得特别好。父亲叫上秘书：“走，去看看！”到了那里，生产队长吞吞吐吐地告诉父亲，他们是把土地的“种植、管理和产量”包给自愿组合的生产小组，多产的部分归自己。父亲感到“包产到组”这个办法很好，可以搞试点，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通过试点，父亲又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只有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1962年7月，葛启平反后重任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调回省里，原地委领导班子全体合影。前排右起为解峰、葛启、张何明、胡开明、李克林。

毛主席：印发给周总理。1962年8月6日
 问：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七月廿日华北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推广三包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下，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指示！
 谨改
 常毅！
 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
 1962.8.8

胡开明给毛泽东的关于在农村推行“包产到组”的建议信手稿，及毛泽东的批示。

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力。”“新的生产管理形式已经被农民创造出来了，这就是‘包产到组’，其核心就是建立生产责任制。”

1962年6月，中央对过去三年极左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原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葛启官复原职，父亲调回省里。7月15日，父亲到省委报到后，回张家口交接工作。路过河北驻京办事处时，正巧碰见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华北局第三书记李立三同志。他们告诉父亲，中央要在北戴河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主要研究农村工作问题，华北局也要在北戴河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与中央会议同步。林铁当即征求李立三的意见，决定让父